



新观察

“破体”和文体创新、文学无界

——兼谈《小说评论》“三栖专栏”主持旨趣 □吴俊

所谓“破体”，简单是指行书的变体，最早是指王氏父子书法中的“改体创制”，就是王羲之在父亲王羲之的书法规范基础上，新创书体，自成一格。具体就是一般所说的行草书。献之也是史上公认的破体书法鼻祖。后人诗云“始从破体变风姿”“文成破体书在纸”。可见，破体之说当是褒义。破体的精义在于立足传统规范基础，博取各体多家特色，臻于创制新体、自我作古的境界。因此，破体往往也就是宗师大家首开风气的创新标志和主要成就。

破体之说后来沿用、引申到了其他领域，不独书法破体，各体艺术的流变创新都有破体之功。但也有了歧义，流俗而下，有时破体成为无视规矩、卖弄小技、躁进侥幸、招摇撞骗的挡箭牌、遮羞布，其恶劣影响广泛及社会，造成了糟蹋艺术而不知为耻的粗鄙陋习。书无定体、文无定法，实际上要看的还是作者的基础功力、经验识见、审美趣味和动手实践的能力。无奈立场各有所重，沿袭传统、规矩守成，或变体出轨、自造新制，争执了千百年，至今仍是纷纭不决。只能说取法高者自有规矩和创新，下流者就不足与语了吧。

文学破体的优劣成败恐怕更容易辨析和理解。古代以来，诗词曲赋小说种种，无不渐进而成，其中多少都有破体制的加持助力，或因破体而终于大功告成，并成固定的规范体。只说近现代吧，草创期的新诗兼有了传统长短句和新体自由诗的文体特点；较熟知的鲁迅散文诗则是典型的破体新创文体，融汇了新诗和现代散文的体式——最近于传统行草书的破体艺术创制。诗剧或剧诗，既是舶来借鉴，也是或副或诗、有剧有诗的兼体、破体而成。创作不乏破体，学术研究一向也重破体——对于王羲之破体的高评，其实也算是古代文艺评价的一种学术褒奖，意义和现在的同行专业评价基本相当，并成书史定论。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与破体相关的文体学，早就是一个重要方向；破体和文体研究成为一种专门学科，如有学者就认为文体研究可为宋代文学的一大关键，等等。

到了当代、新时期，文学的破体新创仍是一般现象，并不少见，而且，越来越体现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进步活力。这已经奠定和显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现状和灿烂前景。

举其显例来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出版后，“跨文体”写作渐成文坛风气，不仅一变为文学批评术语，犹如“80后”之类，也更加受到创作实践的支持，越来越成了最为突出的创作现象，直到迄今未衰的非虚构写作等。破体已经成为现今常态。这也就是广义的变局时代的一种文学反应体现。这就是写作文体形式来看的。如果换作对写作者角色来分析的话，也有“破体作家”（这是我借用书法破体之意的文学活用）的渐趋流行之势。也就是，有的写作者是以破体写作为主要方式，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样的写作者不限于传统的文学创作作家，也包括了学者学术写作，或是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学“破体”的现状背景，形成了我从2020—2021年之交主持《小说评论》“三栖专栏”的初衷。

我之谓破体写作者的含义，引申而言，大致包括了这样几种情况：最先是批评家、学者而兼有文学体裁和文学文体的创作。比如学者教授偶尔“出圈”兼作小说或散文或诗歌，也有学术与创作一向并重，但主要仍是学者的身份。这类创作显然会在诸多方面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职业作家创作，其破体之义既是将文学创作的感性审美注入学术理性的肌理，丰富学者精神人格的滋润涵养，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带来别样风情，并产生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互动沟通。在角色意识上，有助于文学关系中的同情之了解，对文学批评的同情理解、以意逆志，尤为有益。这是我在《小说评论》2021年第1

“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认知之变，思想之变，世界观之变。写作技术有了广义的人生、社会和世界视野。”

期“三栖专栏”开宗明义的“主持人语”中所表达的核心意思。这种学者而兼创作文体的写作者可说很多，我记得文中列举过南帆、丁帆、何向阳、张柠、张清华、张新颖诸教授的大名，个个都是著名学者、批评家而兼或文或诗或小说的名家。

其次，主要是指学者学术文体本身的“破体写作”，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上的学术性创制——显然有别于通常学院教授的规范性学术文体的撰写方式。“三栖专栏”开张时间有限，后者（以作家而撰著学术为主）尚未及具体讨论人选，但拟议中的著名者也是如雷贯耳，成就斐然。老辈如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中年者格非以小说家而有治《金瓶梅》专著，王家新以诗人而同是翻译学家，年轻者也不在少数。前者即学者的破体写作讨论倒是有幸得到两位大家的屈辱支持。孙郁教授的学术文体往往兼有美文个性的润泽，随性自如，亲切率真，真可用作治疗刻板学院文章之弊的良药。毛尖教授则直把性情文字投胎托体成了学术批评，她的文章既是议论散文、又是义理批评，说是学术学理，却又处处杂文笔法。一篇文章而有多副面孔，只有洞察通达、鞭辟入里显出本相颜色。无怪能够妥妥吸粉无数。可惜，这类破体写作在大学里成不了主流。学院论研究的正襟危坐，有规有矩，好似一个理学家面目才算正宗。人情人性人心人道种种，在学术论文体制里恐怕是难以顾及相应温度的了。所以文体别裁的孙郁、毛尖教授们，只难得做了大学里的稀有生物，非常值得好好高抬表彰。他们的破体写作具有独特且几乎难以复制的价值——不仅学术，也很文学。

其三是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所宗文体，无法归类而成极端案例，实质却最是自由而圆融的一种文章文体的写作。这种写作将学术文章、文学批评、散文随笔、演讲谈话、序跋书评等融汇一体。看是随性而谈，信笔写来，无有任何规矩可言，实则四面八方、中外古今都在照应，人生书本、个人社会都有关心。文体形散而精神俨然，行文不羁却有中心，尤见心关切切的温暖性情洋溢纸面。驾驭文字之力可谓笔到心到而意在言外。有人说这是回归到古代文章的体式与境界，不再局限于西风东渐至今的文学分体规矩了，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不过你看李敬泽的文章，也许会想到这与文章作者的抱负胸怀有关，并不一定主要关乎文学文体和写作的技术。还有，超越技术层面谈论问题，我们对天赋才情的理解也许该有一定的默认。所以我说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激发才情，但不能赋予才情。《小说评论》第2期李敬泽专辑，我的主持人语叫作《文章事业 君子不器》，借李敬泽的文章，表达文体别裁之义及有关写作者人格的看法。

事实上，我的这些看法也是近年文学批评新论的一种反应或共鸣。源自创作现象，成于理论批评，激发酿为文学场域的一种话语热点。也是《小说评论》杂志，2021年7月在王春林主编的努力下，召集了一次会

议，主题就是“小说革命”和文学无界。后来还和《收获》杂志联合，共同推动文学无界的创作批评行动——目前还在进行中。除了刊物的推动，这次文学批评新论的

主要发起者我记得是王尧教授。印象里，他首先是在一次会议上首提“小说革命”之议，后在《文学报》上有文章论述发表。对于当下小说弊端的针砭固然是“小说革命”的倡导动因，但积极面向上的理论阐释和有关文学写作的内涵诉求，无疑是更具建设性的动因。助推“小说革命”影响传播更重要的，是不久后倡导者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发表出版，迄今已成最受批评关注的近年长篇小说。多数年度文学类排行榜都有《民谣》的前列席位。而且全媒体的传播加速扩展了对于小说和作者的批评广度。由此连续聚焦，批评理论和小说创作自然叠加在王尧的学者和散文家的身份之上，其中越出小说、批评的文体创新和文学无界的意义一下子就明显和明确起来了。最早的“小说革命”之论溢出了特定文体的范畴，一变而为文体创新之论，再变为超越技术层的文学价值论——所谓文学无界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具体创新体现，更是文学人格、写作精神、包括写作个体将人生觉悟和社会关怀灌注进具体文学行为的一种道义自觉和思想诉求。在此，我既是表达对于王尧教授所倡之论的响应和理解，也是再度阐发“三栖评论”专栏的宗旨。

一般说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论域中，文章体式关联文脉统绪的传承，且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有着内在关联。简言之，文体关乎世界观和思想立场。所谓文章辨体的重要性往往在此。无怪乎文章体式正宗和文化观念正统的契合，几乎就像是表里合一的有机体。即文章文体的形式并不独立于观念意识之外。在现代文学概念里，破除了传统意识藩篱之后，文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了别样的深意。最重要的是，写作与人生的具体实践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个人与社会在写作行为里产生共同的利益交集，写作方式不再主要限于书斋里的个人天地，而是深广地关乎现实的人类状况和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认知之变，思想之变，世界观之变。写作技术具有了广义的人生、社会和世界视野。回头再看表面上矛盾对立的尊体、破体（或谓变体）关系，实为相互交织的共同体，而且终于于创新一体。这是将文体实践的意义提升到辨体观念的更高层，而其价值的广度实现，就在各体文体的丰富写作生态中。

换言之，传统的“破体”贯穿着当代文体创新的实践和理论，内含着写作者文学无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人的文学”——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白生生态面貌。



关注

江苏文学源远流长——特别是南京，备受江南文化之孕育与经济繁荣之滋养，近年来声誉日隆。不过，江苏的长篇小说领域在很长时期内显得不那么令人瞩目，这与每每引领风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时尤其醒目。

如果说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仅仅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达即足以在小说领域傲视群雄，那么时至21世纪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的逆转。不管是否合理，也不管你是否承认，文体形式不再平等为事实。所有文学门类中，小说为大；各种小说文体中，长篇至尊。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与思想背景下，江苏文坛内部也有了江苏长篇小说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慨叹。实际上在新世纪前十年间，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收获颇丰，像赵本夫《无土时代》、苏童《蛇为什么会飞》《河岸》、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毕飞宇《平原》《推拿》、范小青《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周梅森《至高利益》、储福金《黑白》、韩冬《扎根》、鲁敏《六人晚餐》等，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近年来，江苏作家更是将创作热情自觉挥洒在长篇领域，无论是苏南水乡文风昌盛的江南文化，还是苏北大地大气雄壮的楚韵汉风，以及身处南北交界的世界文学之都的金陵文化，都在新时代这片审美沃土上焕发出活力空前的勃勃生机。

最近十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每年都有上百部之多。年轻作家迅速成长，业余作家十分活跃，行业作家引人注目，名家名作更是频频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由来已久的长篇小说影响力逊于其他文体的现象。从历史题材到现实题材，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从现实主义到先锋实验，从文体形式到人性探索，从战争书写到成长叙事，无论从哪一个维度上，近十年江苏长篇小说都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立体创新的强大谱系。更重要的是，每一创作类型中，均奉献出了个性与创新兼备的名作。

作为一部架构于现实与神话、现在与历史、罪恶与抗争、真实与寓言之间的奇书，赵本夫的《天漏邑》层层剖视天漏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气象诡异、人行古怪、历史久远的古代东方文明的标本，围绕这个神秘村落发生的奇奇怪怪、是非非非，小说探源，展现了大自然幽远奥秘的本源与文明人性的最深层秘纹，深入至道德、文化、审美、历史等领域的内核，对读者的审美体验产生了巨大冲击，堪称当代文学中最出色的文明史寓言。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则着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中活跃于南京的个体命运、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其精神力量与审美超越性的确令人刻骨铭心。张新科的《远东来信》以八封信为线索，首次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远遁中国并得到保护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文学再现，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此领域的空白，也不仅在于其揭秘探源的史学价值，更在于它在战争叙事与底层叙事之间，在人性的灭绝与人性的迸发之间，所营构的巨大的思想张力与审美空间。这些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唯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可磨灭。徐凤的《国殇》则通过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凝结了“器”与“道”的关系，容纳了那小至个性大至民族的情感纠葛、价值矛盾与信仰冲突，更蕴藏了国运人心与世事沧桑。在复杂的冲突之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人性战胜了家国，审美战胜了文化。

当代史题材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新时代的今天似可归为一种特殊类型。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活会让人们目不暇接，与传统的断裂意味越来越强烈，曾经被视为现实题材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历史的性质。有些作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现实与历史结合，将当下的潮流与前人的遗产结合起来，以过去推演现在，对当下追根溯源。近年来，江苏长篇小说叙述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史”意识凸显，主体性冲击强劲。而当当代史叙述凸显与作家审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与人性探索意识的加强分不开。苏童《黄雀记》在叙事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以三位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形成互文性的立体式结构。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续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与转型时期的文化迷乱、个体惶惑紧密结合。所谓“黄雀记”，暗示了小说的特殊结构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层层地剥离开去，展露故事背后的真相，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启示。王尧的《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此外，李新勇的《风车桃花》，独到了地表现了当代史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解体的长期过程。李凤群的《大风》则以60余年的家族史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当代史叙述，透露出“当代史诗”的气象。姜耕玉的《风吹过来》通过追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令人震撼地写出一代人的心灵史。修白的《金川河》所述个人成长的悲愤来自亲情、恐惧与憎恨的奇特纠缠。另如杨鹤高的长篇小说《下放户的女儿》，于大时代与小人物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色彩。

江苏作家对于当下生活表现出相当突出的叙述热情和探索精神，充分展现出文学苏军锐意进取的责任感和强大的审美创造力。继《黑白》之后，储福金的《黑白·白之境界》以更为尖锐的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小说所叙的那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几年之后，储福金又苦心孤诣地推出《念头》。小说主人公经由一番复杂的心路历程，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种自我成长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活的纯粹性，被建构成起来。范小青的《桂香街》堪称当代中国“第一部社区文学”。小说独到地打开日常生活中审美的空间，通过琐细的矛盾纠葛和情节冲突，有力地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变人心。如果说《桂香街》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式打开通往审美世界的广阔通道，那么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则是在挑战汉语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闯出一条小说表达的新路径。在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纠缠之中，在三个维度的故事环环相扣的非线性逻辑链中，读者不能不由这些新的路径产生对人与生活本身更深层面的思索。当代生活迅速变幻，都市乱象令人目不暇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人生情态与内在肌理，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课题。鲁敏的《奔月》在把握当下时代的生活与人性现状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思想驾驭能力和超常的审美才华。在我看来，它追问的不是带有身份意味的“我是谁”，而是致力于解决更具哲学本质意义的“我是什么”的问题。鲁敏的小说在许多层面上与传统保持很大的距离，她的几乎每一部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种新的东西带给大家。姜敏的长篇新作《心劫》是情感感恋题材不可多得的重中收获，小说在真情与扭曲、荒诞与救赎的交织中充满人性挖掘的坚硬力度。得力于读者的热情与推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使“人民”的主题凸显为长篇审美的重中之重。小说虽然没有着力采用现代性的表现手法，但其对官场、社会个体精神心理层面以及人性人情的刻画入木三分，人物形象复杂饱满又个性十足。江苏长篇小说在底层叙事与社会问题小说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收获。王大进以底层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眺望》是重要代表作。应该说，从走出《欲望之路》到写出《眺望》，经过近20年的观察思考和审美历练，王大进对于人性与土地、社会与文学的关系都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变化，敏感而理性的强大审美张力灌注于《眺望》的字里行间。

最后，打通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叙述，姑且称其为百年史叙述，这史诗式写作在近年亦极为活跃，令人瞩目。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百余年来黄河故道荒漠中的鱼王庄的变迁，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代代鱼王庄人屡经磨难，顽强不屈，始终坚守信念延续后代，终将荒漠变为绿洲。小说以生命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新路径，在二者相结合的意义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学该领域之内的扛鼎之作。张苏宁的《沁河水家》集百年苏州地域文化史、风俗史、家族史、个体史与民族史于一身，是“中国故事”与“中国讲法”的成功尝试。

江苏长篇小说的「逆袭」

□张光芒

短评

西海固之子的倾情之作

□胡平

厚情感在这里得到宣泄和净化。

在书中，作者一一历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改变西海固面貌作出的不懈努力。自1982年起，国家便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扶贫工程。1996年，中央实行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20多年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扛起历史使命，与宁夏人民一起创造了“闽宁模式”，终使西海固地区与全国各地同步迈入小康社会。改天换地的事实说明，最终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使国家富起来，从而有实力推动一个苦瘠之地获得崭新面貌。

现在我们知道，《西海固笔记》与许多同类题材作品不同。作者更多在无人布置和引导下走遍西海固全境，路上没多少人认识他，更鲜有人知晓他的来意。他可以在随意停车时与路边人闲聊，也可以偶然被一所房屋吸引，走过去打听。当然，对于有些需要搞清的重要事实，如“梯田建设”“盐地治沙”“扬黄灌溉”“开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他也会专门去有关部门了解，继之专题造访。这种以田园调查式为主的采访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贴近生活原貌与真相，也贴近普通人的生存现实。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部书里，几乎看不到什么统计数字，但西海固人的准确感受却被用另一种形式“统计”上来。譬如，这里

人们与水的关系，被季栋梁反复提及和验证。作者有一天逛到固原中庄水库，发现一位老汉蹲在水库边眯着眼睛盯了几个小时，问后得知，老人家是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水，这座水库解决了140万人的吃水问题。在以往，季栋梁作为客人到农家串门，各家的热情问候都是“喝水吗？”那时有山村喝的是“鸡叫水”，即每天早晨鸡一叫人们就要和牲口们一起到山沟里抢水，而如今，这样的村庄里都通上了自来水，院内种满蔬菜花卉。主人的笑容是绽放的，“水甜得干净得，现在好了，美得很！”从这些不刻意的交往中，作者了解到农民们的真实心境。

即便是对流传较广的先进事迹和人物，的记录，在作者笔下也有不同。书中写到原闽宁协作办公室主任林月婵，在宁夏家喻户晓。她在岗位上任职10年，光西海固的土地就踏上过40余次，逐个走村串户，调研摸底，亲自推动“母婴工程”“医疗服务”“母亲水窖”“关爱回族女童”“关爱大学生志愿者”“闽宁月嫂”等援宁扶贫公益活动，可谓尽心竭力。后退休回到福建，患有严重帕金森病，仍心系宁夏。她的事迹已多有报道，但在《西海固笔记》中又有新的场面。作者有天来到固原街头一家羊杂碎小店吃饭，见店里小媳妇不断倚门往外张望，一问才知，她觉得好像刚才在街上看到已退休的“林妈

妈”经过，想不能错过请她进店用餐的机会。厨子丈夫后来也说，当年他和媳妇是在林月婵组织下到福建打工并结识，攒下点钱又在林月婵帮扶下回来开了这个馆子。他们打工人也都称林月婵为“妈妈”，对她感激不尽。这个细节完全来自季栋梁沿街串巷时的见闻，却异常鲜明地铭刻了林月婵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如季栋梁自己所言，他是从“低处”写起的，从小角度切入，以普通人视角切入主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写作选择，也是此书中最值得称道之处。他把作品称为“笔记”，便是一种放低姿态，低到与生活平行，获得的是读者报以的无保留的信任。

《西海固笔记》具象色彩较为浓厚，渗透出一种并不常见的气质。它尽量避免像有些报告文学那样，在场面写照之外，纳入大量文件体、新闻体和议论体文字，形成文体两类文体的间杂和兼容。此作的文笔风格基本统一，即使遇到概括和论述性内容，也多以平易的文字表达，这使通篇更接近长篇散记，大量保持现场感和直观性，活跃着生动的环境和人物，阅读起来像散文一样舒适自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要下些暗功夫的，作者重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为创作增添了许多魅力。此外，作者也规避了对小说文体的摹仿，排除过于细腻的描述，保持叙述的通畅。这些都说明，西海固作家是有功力的。



季栋梁被称为“西海固之子”，在故乡生长20多年，他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里，不少内容并非出自作者的采访，而来自他从小留下的生活记忆。在回忆中，只要花点钱，西海固人都嫌贵，一盒两分钱的火柴都不带，靠火草续火。有的家庭里只有一个碗，爷爷先吃，吃完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那里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艰难生存。而今天，季栋梁开始怀着另一种情绪回来了，他自2018年起由儿子开车重走西海固，往返三四十趟，慢慢走，细细看，更多是一场场目睹人间沧桑巨变的体味，一个老西海固人与家乡一起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其中的百感交集重新难以形容。这就可以理解，他写出的《西海固笔记》为何感人肺腑，沁人心田。它不仅来自一次倾力写作，更来自一位本土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他长期积聚的深

